

44.654
LDC

320578

老红军话传统

山东人民出版社

老红军话传统

临沂地区出版办公室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老红军话传统

临沂地区出版办公室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625印张 75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600

书号 3093·707 定价 0.25元

目 录

- 革命事业是最重要的……………何长工 (1)
- 政策与生命……………严雨霖 (5)
- 贺老总查粮……………尹兴桂 (13)
- 在徐总身边的日子……………赵国如 (17)
- 在奔袭泸定桥途中……………曾 治 (20)
- 一碗野菜汤……………吴志明 (25)
- 张连长和他的慰问袋……………方中元 (27)
- 在生死关头……………张德安 (32)
- 让药针……………罗明远 (36)
- 我们的石看护……………李 进 (40)
- 尝百草……………谢奇贵 (46)
- 两碗炒面过草地……………何立臣 (49)
- 红军的草鞋……………何传修 (53)
- 两次跌伤 两种遭遇……………陈伯华 (57)
- 刘志丹受罚挑水……………王满仓 (61)
- 三封赔偿信……………方中元 (64)
- 从仇人到战友……………尹兴桂 (70)
- 周副主席教我们学文化……………吴志明 (76)
- 行军大学……………何传修 (80)
- 小石板的故事……………尚学文 (83)
- 朱总司令种菜……………侯正果 (88)

无声的命令.....	刘鹏来(91)
我的战友.....	苟廷英(93)
一支驳壳枪.....	钱 钧(97)
两块布头.....	曾炳华(100)
我这个理发员.....	姚林泉(104)
改名字的故事.....	周长胜(108)

革命事业是最重要的

老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学院院长 何长工

革命艰险，道路崎岖，要我谈谈六十年的经历，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不过有一点我却认为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一个革命者必须打破功名利禄、富贵荣华、权利地位、待遇享受等观念，树立起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观。只有这样，才能摆正个人和革命的位置；才能经受严酷的考验，才能保持对革命事业的坚贞。

大家都知道，我的亲属中有几十口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杀害。这种事，在那严酷的革命斗争年月里，是并不少见的。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岂止我何长工一家！

其实，我的一家有两次机会可以免于遭难。第一次，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我以鄂东南地区和红五军代表的身份，和几个同志一起到上海去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军事会议和湖北省党的代表会议。我们随身携带了在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时从地主豪绅那里没收来的一千多两金条。由于我们的伪装和随机应变，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顺利地交给了设在上海的党组织。党组织接受这批金条后，发现它的实际重量超过了我们自报的重量。这是因为我

们是用乡间土秤称的，乡间的秤比城市的大。党组织当时想把多余的部分交给我处理，并建议我用这些黄金打通各种关系，把住在家乡的爱人和两个孩子接到上海来，把爱人安排到上海学纺织，把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去培养。我对组织的关怀非常感激，但没有接受一分一厘黄金，没有把爱人、孩子接出来。我想的是：公款不能用于私事。

第二次，我担任红八军军长，七月带领部队首克湘军何键盘据的长沙城。这次战役，歼敌近五个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筹款四十多万银元，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装备也得到较大的改善，并建立了长沙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总工会。这次震惊中外的长沙战役，大长了我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这时，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你是攻打长沙的军长，又是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敌人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家属肯定会有危险。是不是开个会，以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名义，用一点缴获来的钱，把你的家属从老家接出来？我以同样的理由，又一次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好心的建议。

果然不出所料，这年九月，在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利之后，反动军阀何键亲自下令捕杀了我的一家：我的妻子，两个幼儿，还有其它亲属。我的妹妹何鸣一，是华容县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那年她才二十五岁。当被押赴刑场时，她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

亲人惨遭杀害，每次思念起来，都感到无限悲愤。但是，如果不是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和广大人民忍痛做出牺牲，要想夺取革命胜利，建造共产主义大厦，是根本不可能的。

谈到自己，我不过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个老兵，谈不上有什么功劳。因为个人的历史是和党的历史、解放军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联系着的。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滚打出来的。想想过去那些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战斗年月，很多老战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了。例如，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就是在兴国县东固方石岭战斗中挨着我倒下的。再拿武汉警卫团来说，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三千多人，现在只剩八、九个人了，其中大部分同志牺牲在战场上。是他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党和人民的好儿女，用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党旗、国旗和祖国山河，在他们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计较自己的功劳大小和地位高低呢！

当然，不计较不意味着不碰到。几十年来，我的职位的变化是频繁的。我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曾担任过湖南省洞庭湖西区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马日事变”后，我到武汉找到了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毛泽东同志，他给我改名“何长工”，派我到武汉警卫团作军事工作。起初，我只是个班长。有人对我这个“留洋学生”、“总指挥”，只当个小小的班长不理解，我却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我想到的是组织的安排，革命的需要，一心迎接新的任务的到来。从一九三〇年到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这期间，我一直担任军长。长征到达延安后，我调到抗大，最初只是一个队的队长。从军长到队长，职位看来下降了不少，但这有什么呢？这只是革命岗位的调换，是工作的需要，再也没有也不应该有别的理解。

我常想，我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野心，有权欲。应该只认识公家，认识组织，服从组织。组

组织和集体给我的任务，我千方百计去完成，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组织和集体给我的荣誉，我接受，并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地去为党工作。组织指出我的问题，我改正，绝不文过饰非。从参加革命那天起，个人的甘苦、生死、得失和荣辱都置之度外，时刻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求自己。我觉得，我既然认准了革命这条路，就要不顾一切地走到底。如果革命是一帆风顺的，比喝水还容易，那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政策与生命

老红军、原沂源县

武装部部长

严雨霖

我在一九二七年参加了红军，开始在连队里当战士，后来调到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给总指挥贺龙和政治委员任弼时当警卫员。

永远把它藏在心里

一九三四年十月，举世闻名的长征开始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首先从中央根据地出发长征。后来，我们红二、六军团（即二方面军的前身）也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从湖南的桑植出发，冲破敌人的包围，开始了长征。在出发的头一天下午，总指挥部召开了排以上的干部会议，贺龙同志在部署完战斗任务后，从口袋里掏出一迭白布苏票（苏区银行用漂白布油印的一种在根据地内通用的货币），对大家说：“中央红军经过的地方，都是用苏票和群众交换物品，部队走后，这些票子就不能继续使用了，特别是敌人重新占领的地方，已成了非法的了。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银元和国民党的钞票把中央红军留在群众手中的苏票换回来。”

听了贺龙同志的话，不少人面带难色，窃窃私语：“光打仗就够呛的啦，还弄这些干啥？”

贺龙同志似乎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又提高嗓门说：“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只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决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经他这样一说，大家才认识到这项工作关系到群众利益，因而变成了自觉的行动。

长征路上，我们红二、六军团一面行军，一面战斗。与此同时，每到一处就要放上大桌子，摆上银元、钱钞，敲锣打鼓，欢迎群众来兑换苏票。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拿着苏票走来，又含着激动的泪水把银元换走。

后来，我们来到云南昆明东北方的一个比较繁华的小镇附近。因为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时，曾在这里进行过比较长时间的休整，花费了不少苏票来补充弹药和粮食。中央红军走后，这里又被敌人占领。我们红二、六军团要在这个小镇把苏票换回来，必然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到底打不打？苏票要不要兑换？战士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打，理由是，兑换苏票是党规定的政策，要坚决执行；也有的主张不打，理由是，为了兑换几张苏票拼命流血，不值得。

贺龙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动员报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策和生命相比之下哪个重要？我看是政策。只要认真执行政策，就能取信于民，得到群众拥护。如果不认真执行政策，就必然失信于民，遭到群众的反对，今后的工作就难以开展。我们工农红军宁可献出生命，也要执行政策。”贺龙同志的讲话，提高了大家的认识，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敌人被消灭了，红军胜利地进入

了这个小镇。但是，镇上却家家锁门闭户，街上冷冷清清。我们在街口安上方桌，摆上银元，大张旗鼓地宣传兑换苏票，却无人来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通过调查，我们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敌人占领这个小镇时，曾经围绕着苏票大作文章，他们把有苏票的人统统宣布为“私通共军”，把这些人的家属宣布为“匪属”，轻则游街罚款，重则被打得皮开肉绽。一位收藏苏票的老大爷，还被吊在树上，打得奄奄一息。敌人还扬言，谁要再和红军接触，就要杀头剜眼。敌人的恐吓和欺骗宣传，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怎么办呢？首长要求我们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把群众手里的苏票换回来。于是我们分成许多小组，拿着银元、钱钞，分别到群众家去，一面宣传革命形势，解除群众的顾虑，一面宣传兑现政策，换取苏票。这些做法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很快把苏票兑换成了银元。群众说：“红军和白军，一样人两样心：一个爱黎民，一个害百姓。”那位身受重伤的老大爷，一手惦着苏票，一手托着银元，满眼含泪地说：“苏票比银元贵重得多，不是用钱能兑换的，我要永远把它藏在心里！”

“我要当红军”

我们红二、六军团进军至沙拉沟一带时，遇到一股白军的抵抗，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消灭了这股敌人，并且击毙了敌师长，活抓了不少俘虏兵。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把满腹仇恨集中在俘虏身上，纷纷向首长提出要求：严惩俘虏，为死难烈士报仇！个别同志还

磨好了刀，擦好了枪，随时准备执行任务。

总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作出两项决定：一、采取紧急措施，保证俘虏的安全；二、在全军广泛深入地进行宽待俘虏的政策教育。

政治委员任弼时同志，深入连队，耐心宣传党对俘虏的政策，对我们讲起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讲完故事后，笑了笑问道：“古代的诸葛亮都懂得正确对待俘虏，难道我们工农红军还不如一千多年前的古人？”

任弼时政委的讲话，象一阵春风吹散了大家心头上的迷雾。结果，红军战士认真执行了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我们向被俘人员宣布了党的政策：愿意参加工农红军的，热烈欢迎；愿意回原来军队的，热情欢送；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被俘人员听后都深受感动。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领到五元回家的路费，激动地对战士们说：“长官，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们离开沙拉沟不久，一股敌人又耀武扬威地追上来。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总指挥部决定，对跟踪的敌人进行坚决还击。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敌人组织了十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这时，从我们左翼的密林丛中突然钻出一个人，他举着双手悄悄地走来。等他来到我们面前，才认出他就是那个在沙拉沟被释放的青年。

战士吃惊地问道：“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当了白军？”

那青年憨厚地笑了笑说：“路上又被他们抓去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些天来，我经常想，怎样才能报答红

军的恩德呢？后来想到，你们缺少枪支弹药。”说着，他把身上的枪和子弹带解下来，交给了我们。

看到这情景，许多战士热情地说：你参加红军吧！青年摇了摇头说：“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说着，一转身又钻进丛林里了。

从那以后，这位青年又被我们俘虏过三次。每次被俘，他都给我们带来枪支弹药和军事情报，第三次还带来一班人马。在连队组织的欢迎会上，他高举着拳头激动地说：“红军救了我，我要当红军！”

“红军，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我军进抵四川省的钱江时，住在县城天主教堂的一个德国神甫，跟随白军逃跑，被我们一起俘虏过来。

俘虏了一个外国神甫！这消息闪电般地传开了。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跑来观看，把神甫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七嘴八舌，指手划脚，这神甫低头闭眼，一言不发。

消息很快传到了总指挥部，贺龙和任弼时同志立即派通信员骑马赶到现场，把神甫接走。在总指挥部里，两位首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但又严肃地指出了他利用宗教活动，奴化中国人民的罪行。这时，密集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接连不断地传来，后面的敌军离我们越来越近。贺龙同志告诉身旁的神甫：“战斗就要开始了，你可以马上回去，但现在回去危险性很大；你也可以跟红军再走一段，等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你送回去。”这位“客人”同意了第二种意见。从此，在我们长征的行列里增加了一个外国人。

总指挥部对这位“客人”非常关心。当时部队的主粮是苞米和带皮的稻谷，哪顿饭能吃上点咸菜就算改善生活了。可是这位“客人”一日三餐两菜一汤，隔一天还要吃一回鸡，吃一次鲜鱼，并专门为他买了白糖、糕点。许多战士对这样的安排很不理解，有的说：“还是外国人吃香，当了俘虏，享开了清福！”也有人说：“这是政策嘛！”任弼时政委听到后，笑了笑说：“说得对，红军要壮大，革命要胜利，就得执行各项政策，其中就包括宗教政策嘛！”

这位外国人开始时整天板着脸孔不言不语。时间长了，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有时还到外面走走逛逛。他看到我们红军战士对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忠心耿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北上抗日，心中十分敬佩。在一次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几个战士受了重伤，被抬进战地医院，其中有一个战士腿里还有弹片，需要立即开刀。就在进行这项手术时，这位“客人”悄悄地走来观看。

按照惯例，动手术前对伤员必须局部或全身麻醉。但当时我们的战地医院缺少麻药，军医迟迟没有动手，那位伤员看透了医生的心思，坚定地说：“关公能刮骨疗毒，咱就不能腿上取弹？！您放心，我一定能撑得住！”

手术开始了，伤员咬紧牙关，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豆大的汗珠不断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却不叫一声苦。医生的泪水和伤员的汗水交融在一起。手术结束的时候，伤员昏迷过去了，军医也瘫坐在地上。红军战士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把“客人”惊得目瞪口呆。他跑进司令部坚定地说：“我想办法，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弄药。”他连夜写信给外国，介绍情况，要求给红军送药。

三个月后，一批西药果然运到了总指挥部。“客人”临走的时候，贺龙、任弼时同志专门召开了欢送会，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在热烈的掌声中，“客人”伸出大拇指说：“红军，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红军——亲人

红军爬过雪山，穿过草地，到达了藏族聚居地区。

进入藏族聚居区前夕，总指挥部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贺龙和任弼时同志都讲了话。他们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影响和藏族上层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藏族聚居地区的人民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可能会发生一些误会。但有一点大家必须明确，藏族人民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一定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正如首长分析的那样，当部队进入藏族聚居地区时，很多藏民如临大敌。他们摆兵布阵，打枪射箭，阻止红军前进。有一天傍晚，我们正沿着山路行军，埋伏在巨石后面的一群藏族青年向我们开枪射击。战士们心中的怒火再也难以压抑，纷纷端起枪来推上子弹，眼看一场战斗就要发生了。

“住手！”一个宏亮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大伙回头一看，是贺龙同志。他严肃地问道：“政策和生命到底哪个重要？”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政策！”

贺龙严峻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隐蔽！”

红军战士隐蔽起来，藏族青年打了半天枪，看看无人还击，也就自动撤退了。

红军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藏族同胞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们用箭射来一封书信，信上说：“红军不是仇人是好人，今后坚决不打红军。”

任弼时同志拿着这封信，激动地向大家说：“藏族兄弟过去把红军当成仇人，现在当成了好人，这只是第一步，今后我们还要变成他们的亲人！”

怎样才能把好人变成亲人呢！首长们费尽了心血。他们召集附近的商人开座谈会，选拔精明强干的战士，扮成行商，打进村寨，了解藏族同胞的要求。通过深入调查，首长们知道了藏族同胞急需两件物品：一是枪支，二是食盐。于是，便把一担担好枪，一桶桶食盐，运入寨中。藏族兄弟惊喜若狂。青年人拿起枪支放声歌唱；老年人手捧食盐热泪盈眶。山寨上下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打开寨门，迎亲人进寨！”

寨内，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我们红军在歌舞声中开进寨中，和藏族兄弟亲切握手、拥抱，观看了他们的歌舞，参加了他们的宴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阿妈，握住战士们的手，无比激动地说：“红军——亲人。”

经过短时间的休整，部队继续向北进发。队伍前面，藏族兄弟弯弓盘马为红军带路；队伍后面，藏族兄弟用骡马驮着青稞和牛羊肉，为红军送行……

光阴如水，岁月流逝，从长征到今天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总指挥贺龙同志和政委任弼时同志亦离开了人间。但是，他们那“政策重于生命”的思想，坚决执行政策的革命精神，却千古流传。